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访谈

王俊斌 王胜 王宇英

梁景和◎主编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
访谈录
【第一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

第一辑

梁景和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梁景和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656-0002-9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社会发展史—史料—中国—现代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5259 号

ZHONGGUO XIANDANGDAI SHEHUI WENHUA FANGTANLU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 (第一辑)

梁景和 主编

责任编辑 马 岩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412 千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zuozhejianjie

梁景和（1956—），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先后师从龚书铎先生、李侃先生、林增平先生、耿云志先生。担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女性文化》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其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并主张用多学科的角度看待社会文化的演化，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文化问题。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委等科研项目，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要专著有《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中国陋俗批判》、《日本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主编有《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论丛第一辑：社会生活探索》等。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代序）

梁景和

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大陆史学界所重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地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资料，然后再经过筛选和比照，分析和辨伪，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口述史学对史学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本文是对口述史的一个初步的思考和实践体验。

一、关于口述史的回望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人类历史上，在撰写史书之前，就有从事过运用访谈和调查进行搜集史料的工作，在中国三千多年前，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依据大量的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互引证而撰写的。在西方，如早期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使用口述证据的。在古代希腊，“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根据事件的目击者所做的证词去推究事实的真相”^①。这里的证词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口述证据。实际上，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口述。例如：社会史广泛使用的官方调查委员会的社会调查资料主要是来源于口述，其中有很多证据都是经过对目击者的访问而获得的。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方法，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

美国自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立以来，1953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成立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195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

^① [美] 里特尔编：《历史学概念辞典》（W·Ritter,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纽约，1986年版，第193页。

口述历史项目；1966年9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罗黑德湖举办了美国口述史学第一次大会；1967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正式成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至1967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余个研究口述史学的专门机构。对美国口述史学未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总统口述历史项目，对每任总统卸任后进行访谈的资料整理完毕后，相应地设立总统图书馆。这一项目推动了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口述史学出现了“人民性”或“民主性”的倾向，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的黑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到1978年，口述史研究机构增加至500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普及，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等。1994年夏天，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口述史学国际大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学者。这个学会每年都有2500多名学者从事口述历史研究^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20世纪在五六十年代就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实地调研，并撰写了一些调研报告^②。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注重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界也有体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颇受学界好评，这套丛书有《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等等。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在90年代曾做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此外，近年来还有几本出版的口述史专著值得一提，如：定宜庄著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四卷本：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过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③。

近些年来，中国口述史学越来越被关注和重视，大概是受几个因素影响

① 参见杨祥银：《当代美国的口述史学》，《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见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透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中国口述史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还研究得不够，需要认真地总结。

的：其一，受文学和社会学利用口述方法取得成就的影响；其二，扩大史料范围的需要，档案文献不再是唯一的史料；其三，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的需要，历史学家对普通人生活兴趣的增长，把普通民众作为历史著作中的主角；其四，现代音响技术尤其是大量的廉价录音机的上市，是以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作为基础，犹如计量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必须借助电子计算机并以它的推广作为其发展一样。

口述史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史料的收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好铺垫工作。

二、作为方法或学科的口述史

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实践和研究。

如果从中国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和西欧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撰写历史的时代算起，“口述”最初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来运用的。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口述”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一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地运用。既在历史学领域（包括社会史、政治史、婚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家庭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性史、娱乐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领域），也在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学和医学领域被运用。它基本上是用来进行资料和数据采集的方法，并以此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作为方法是最容易理解和认同的，这种认同是多学科之间的共识。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开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界所从事的口述史研究开始力图打破方法的界限，并要从学科的角度来认识和建设“口述史学”，这样就出现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口述史”。这种口述史的最大特点是“拿来主义”，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把口述内容用文字反映出来，并把它冠名于口述史，这样做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上述我们提到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定宜庄著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等等，都有这类口述史学的特点。

问题进一步展开，就是有学者直接提出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这种提法是大胆的，对传统史学将产生很大的冲击力。我个人认为：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认真地实践和研究。

把口述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首先要明确这个分支学科的界定和科学含义。它是否要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1997 年 6 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98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吻合。一般来说，相吻合比较合适，遵守了国家的规定，具有规范性。按照《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我国现有学科门类 12 个，一级学科 88 个，二级学科 381 个。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含 8 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国现有学科门类 11 个，下设 71 个二级类，249 种专业。作为历史学下设 5 个专业，即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如果口述史是作为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就要研究它与其他 8 个二级学科的关系，阐述它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一旦这样做，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其他问题。因为口述史学很难有独特的只有自己研究而其他二级学科不去研究的内容，就是说口述史学研究的历史内容已经被很多二级学科涵盖了。如果口述史作为二级学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否考虑把它作为一个三级学科来看。而作为三级学科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首先，所谓三级学科只是一些学人的说法，在严格的学科分类上，并不存在什么三级学科，学人往往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课题愿意说成三级学科，这样的三级学科显然带有太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不科学性。如果把口述史硬性说成是三级学科，还要阐述三级学科的科学界定和三级学科的范畴或种类，这就更加困难，不是我们研究口述史的学人轻易就完成的。如果口述史是作为历史学本科专业的一个分支学科，就要研究它与其他 5 个专业的关系，阐述它自身的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这样做同样面临着上述的困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不转换视角，不冲破固有的框架，硬要在原有的学科定位内挤出一块空间，确立一个新的学科，无论如何，难成大功。

学科分类是人为的，是对以往知识范畴和内容的总结和分析；学科分类是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索新知识的平台和基础，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也正是因为学科分类是人为的，所以学科分类也是有局限的，它需要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当然，这种修正和调整不是随意的，而是在探索知识的实践中，在有了相当的积累和丰厚之后，方能水到渠成。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交叉学科的不断形成，新的学科体系的诞生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实践、实践、再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深入认识口述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并在理论上得到总结和提升，这就可以为史学发展作出自身的重要贡献。从全国的角度看，目前我们应当以“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一个“十一五”的重点科研项目，或向教育部社科司申请一个“十一五”的重点科研项目。然后组织全国的力量来共同从事并完成这一项目。项目的名称可定为“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此项目可以撰写3部专著，分别为《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欧亚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每部著作20万—30万字。或只撰写一部专著，书名为《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本专著分为3编，上编为《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编为《欧亚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下编为《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全书共40万—50万字。通过这项课题认真梳理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欧亚和中国口述历史各自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重要特征、代表人物和著作、经验及问题等等。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它既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高校口述历史的教科书，为高校开设口述史学提供方便，并为下一步的学科建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着重讨论的几个问题

为了规范口述史的方法，严肃口述史的研究，在此还要着重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 严格区分访谈录和口述史

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要严格区分两者的异同。访谈录是对被访者的一个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的经历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访谈录的确是生动的，口语特点突出，容易理解，形象感强，给人留下的印象鲜明。而口述历史虽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特点，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甚至相反，有时由于思辨和论证的需要和对深层问题的探究，可能会显得抽象和深长。

2. 研究口述史应当有自己的专业领域

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学有所长。这不仅要求史学工作者有自己专长的二级学科专业，而且要求有自己的专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这不是反对一个学者要有广博的学识，而是要求一个学者在科研工作中能真正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个人的生命经历决定他必须专攻一定的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在进行口述史的研究时，也不能漫无边际，不要自己的特定领域。要在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内划出进行口述史的范围，这样做出来的口述史会有学术的品质，否则我们进行的所谓口述史，大概就是一般的访谈而已，绝不能冠以口述史的名义。因为口述史是史学研究，不通过研究就谈不上史学，自然也谈不上口述史学。所以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特长划定自己研究口述史的领地，口述史学不是儿戏，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更不是人人能为的。只有那些有历史专业训练，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素养的学人，才可能胜任从事口述史学的工作，并做出自己的成绩来。

3. 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不是任何历史领域都能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存在，提供口述者的基本人群；口述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公之于世，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起码可以与来访者进行沟通交流。从这些条件看，在国内，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口述史研究优于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史优于中国近代史。当然，如果从更广的含义来理解“口述”，那么民间传说等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口述”，用它可以研究远时段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它比起近现代和现当代来说是不占优势的。若没有民间传说流传下来，也就只好运用其他的资料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了，从这一点看，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另外，不同的领域对口述史来说，适用度也不同。如社会文化史或“人民史”更适合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比如英国的口述史就是主要应用于社会史领域，特别是在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等，都是采用口述史学方法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阶层的人们社会生活状况。正因为如此，史学工作者不能盲目轻易地转向口述史的研究中去。

4. 抓紧对新中国60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口述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0年了，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说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目前国史研究的成果不可能是丰厚的；也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国史研究的领域也不能平衡的发展。在国史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条件可能更成熟些，所以应当着力并抓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化史的

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婚姻家庭、两性伦理、娱乐消费、文艺体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宗教信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这些社会文化史又特别适合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且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也比较充分。很多口述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犹新，可以弥补新中国 60 年来的社会学资料遗留很少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报刊由停刊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困难。所以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新中国 60 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史学工作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于口述史学，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迷惑和问题。首先是对口述史的认同问题。口述史的合法地位至今还没有得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的公认。迟至 1981 年，英国著名的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在《历史学的性质》中说道：“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① 在他罗列的史料类型中也没有提及口述史料。在目前的情况下，收集口述证据的必要性以及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优缺点的讨论，尚未引起史学界更为普遍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交流方式包括文字交流和口述交流两种形式，其中“口述”资料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之一。其次是回忆的可信度问题。被访者回忆过去的经历以及如何理解和认识其经历，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任何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有局限性的。访谈的场所和气氛，访谈者的身份以及他的引导和感染，被访者记忆的误差以及在表达过程中刻意的修饰、夸张和自我拔高以及回避、掩饰和难言之隐，都在所难免。受后来经历的影响，也可能造成“过去的声音”成了“现在的声音”等等。最后，采访者理解上的误差，采访者学识的深厚程度、理论水平和判断能力，对采访内容的熟知程度，这些都影响采访者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误差程度。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要通过我们的实践和努力逐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坚信，中国的口述史学在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领域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

① [英] 马威克：《历史学的性质》（Arther Marwich, *The Nature of History*），伦敦，1981 年版，第 141 页。

目 录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代序）	梁景和 1
--------------------	-------

卷一：土改、农业合作化

1. 毛泽东让组织起来，咱就得组织起来	3
2. 合作化政策得听领导的	20
3. 党员干什么都要走在群众前面	40
4. 我是怎样领导互助合作的（上）	50
5. 我是怎样领导互助合作的（下）	58
6. 基层领导办社积极性很高	70
7. 土改把人整怕了	82
8. 农业社产量没有明显提高	87
9. 模范农业社的带头人	98
10. 一个普通社员眼中的合作化	114
11.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	152
12. 我为什么要加入农业社	167
13. 我所经历的互助合作	172

卷二：医疗卫生制度

1.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	187
2.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二）	196
3. 我的半农半医培训经历	202
4. 合作医疗制度兴衰的根源	207
5. 公社医院会计眼中的合作医疗制度	212
6. 从卫生员、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214
7. 我的产褥热经历	216
8. 公社卫生院——三级医疗保健网的中枢	218
9. 自力更生、勤俭办医	231

10. 一个农村女青年的赤医人生	236
11. 我们是如何开展“两管五改”工作的	240
12.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245
13. 深泽县合作医疗第一家	257
14. 一个联合诊所的变迁	263
15. 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半个“傻子”	270
16. 深泽县“北大荒”医疗卫生事业的今昔	273
17. 一个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的“文革”经历	277
18. 从西医学徒到公社卫生院院长	282

卷三：“文革”的家庭文化

1. “铁姑娘”	289
2. “‘窝里斗’不好”	292
3. “这里不乱”	296
4. “难与命相争”	297
5. 女人命苦	299
6. 艰难时日	301
7. “‘文革’时我没出去”	303
8. “往事不堪回首”	304
9. “被专政了几个月”	305
10. “噩梦”	307
11. “我出身好”	311
12. “北京来的人”	312
13. “文革”大家谈	313
14. “不跟着起哄就不乱”	318
15. “‘文革’中的我们”	322
16. “那时我们很年轻”	328
17. “父亲影响了我”	334
18. “我选择不了社会和时代”	338
19. “我从兵团走来”	341
20. “最典型的无政府状态”	346
21. “我一直都很逍遥”	348
22. “我家里没有派性”	351

23. “我随父母下干校”	352
24. “那时我是红小兵”	353
25. “出身真重要”	354
26. “我也曾去抄家”	355
后记	357

卷一：土改、农业合作化

王俊斌采访整理

1. 毛泽东让组织起来，咱就得组织起来

被采访人：陈秉荣，1941年4月22日出生，山西省保德县石塘村人。原保德县农工部、公社干部，曾主编过《保德县志》。

采访时间：2008年2月18日

采访地点：保德县东关镇

问：大爷，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答：虚68岁，四一年阴历三月二十六，阳历四月二十二日。

问：大爷，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简历吧。

答：简历很简单，六一年参加工作，教了两年书，调到机关上，先后在县委农工部、学毛著办公室、宣传部、县委办公室等单位干了十来年，宣传部办公室当了副主任，然后下的公社，公社当了五、六年书记，回来当文化局长，以后是档案局局长。

问：你的文化程度是什么？

答：五寨师范。

问：那时候完小是不是就可以上五寨师范？

答：五寨师范很复杂。五寨师范成分很多，有的是完小时直接考上的，有的是初中念完考上学习两年的，有的是上三年的，当时还有老师短训班的，成分很复杂。我们是比较正规的初中念完考上的，念了三年，实际上我们念了四年，中间实习了一年，又回去补得念的。两年头上出来实习的，又回去。

问：毕业后去哪当教师的？

答：走了四个地方，腰庄、庙梁、桥头、扒楼沟。那时候我是好老师，扒楼沟村有一年教的三十七个学生，六年级班，三十二个考上中学，那时候很有名气。六四年回来县里，正好县委缺人，一批老干部提拔了，如张青海、袁部红、康建业、杨万续，这些一提拔后就缺了干事，需要补充，从哪里调？只好从教育界，因为要写材料，再一个是“四清五反”开始了，缺干部，就从教育上补充调回很多干部来。

问：那时候各行业中从教育上走出来的干部很多？

答：保德的干部前期基本上都是从教师岗位出去的。六十年代以前的都是从教育界出来的，后来是大学毕业回来的多。因为我们以前基本没有大学生，